

伦理困境中的女性选择： 文学伦理学视角下的《湖面如镜》

骆秦、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

摘要

《湖面如镜》是马来西亚华文女性作家贺淑芳的短篇小说集。集中九篇作品以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女性为代表，着眼于爱情、婚姻、家庭、职场、宗教、种族等多个领域，描写出她们深陷于压抑、窒息的伦理环境下，基于各自漂泊又边缘的伦理身份，在挣扎与纠结中做出的伦理选择。贺淑芳将公共议题搬进小说，在书写中延续指控，为女性群体发声，担负起写作者的伦理责任。小说集对女性议题的犀利思考与高度的自我指涉，表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她对女性议题的深切关注，对当代女性打破性别压迫，重建被剥夺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贺淑芳，《湖面如镜》，马华文学，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

* 骆秦，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潘碧丝，博士，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

Women's Choice in an Ethical Predicament: A Study of *Lake Like a Mirr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LUO Qin, FAN Pik Shy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Lake Like a Mirror is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Malaysian Chinese female writer Ho Sok Fong. The nine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represented by women living in Malaysia, focusing on love, marriage, family, workplace, religion, race and other fields, describing the ethical choices they make in the struggle and entanglements based on their wandering and marginal ethical identities under the oppressive and suffocating ethical environment. Ho Sok Fong brings public issues into the novel, continues the accusation in the writing, speaks for the female group, and shoulder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writer. The sharp thinking and high self-reference on women's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of novels show the writer's uniqu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her deep concern for women's issues,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women to break gender oppression and rebuild the deprived right to speak.

Keywords: Ho Sok Fong, *Lake Like a Mirror*,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emale novel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一、前言

贺淑芳是马来西亚极具代表性的华文女性作家，她 1970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先后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物理应用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班；担任过工程师、报刊记者、大学讲师。她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湖面如镜》，曾获 2002 年“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08 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15 年“九歌年度小说奖”与 2016 年“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补助，是马华文坛“七字辈”的代表作家之一。贺淑芳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书写对象，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主要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她们的生存状况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贺淑芳渴望认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希望过独立的生活，而她本人也常常将个人经历映射到小说中。她笔下的女性大多都被爱情所困，让婚姻所弃，给事业让位，她们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情爱中的孤独寂寞，饱受着生存危机的煎熬。《湖面如镜》直面女性身处复杂伦理环境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伦理矛盾，以及她们基于各自伦理身份，做出相应伦理选择时表现出的挣扎与无奈。作者将公共议题搬进小说，在书写中延续指控，为女性群体发声，担负起写作者的伦理责任，使得《湖面如镜》除了文学与美学上的独特韵味之外，还兼具了批判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困顿与失声：压抑、窒息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2010，页 19）。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甚至要求批评家自己充当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的代理人，做他的辩护律师，从而做到理解他（聂珍钊，2014，页 256）。

《湖面如镜》中描写的女性角色全都生活于马来西亚，贺淑芳笔下的她们大多过着平凡庸常的生活——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工作，在穷乡僻壤或小镇重复上一代的生命周期。但同世界其他地域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都置身于多重不利的伦理环境中，遭遇到各自的伦理困境。

首先是父权统治与性别歧视的全球环境。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由来已久，母系社会之后，女性就一直处在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作为统治阶级，使用各种手段控制女性，限制她们的交往和发展。时至今日，即使女性已经基本得到了和男性同

样平等的地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性别歧视仍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留,这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 DESA)发布的《2020 年世界妇女:趋势和数据》(*The World's Women 2020: Trends and Statistics*, 2020)全面分析了 25 年来全球性别平等状况。报告指出,尽管全球妇女的境况日益改善,针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在慢慢改变,但在经济、政治、健康、教育、职场、劳动力参与、平等发声、针对女性的暴力等领域的进展停滞不前,总体上远未实现 1995 年各国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的承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2023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1949-)就妇女地位问题发出警告。他表示,根据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工作的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估计,世界距离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还要 300 年,两性平等的进展“正在我们眼前消失”(Subramaniam, 2023)。

当下全球女性的真实生存状况可从这些报告里得见一斑,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女性自然也逃脱不开父权社会的伦理环境对她们的禁锢。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一夫多妻制在马来西亚成为合法的婚姻制度,一位穆斯林男性最多可以有 4 名妻子,无怪〈天空剧场〉中理发店里的女人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出“一个男人有钱之后养起小老婆,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男人不会动辄为此离婚的,他们不会那么傻。但做人老婆自杀就真是太傻了”(贺淑芳,2014,页 44);“哪只猫儿不偷腥?哪个没在外边走私过?只要他给钱给家用,那他心里就还有老婆和孩子,就算是好男人”(贺淑芳,2014,页 48)等诸如此类荒诞的言论,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在不那么令人窒息的环境下成为她们可能成为的人。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中,她们不光对自身处境日渐麻木,甚至嘲笑比她们更不幸的女性命运,“一想到这种不幸,身心就颤抖起来,厄运比幸福更让人激动”(贺淑芳,2014,页 44)。马来西亚女性在父权统治下遭受的压迫可谓触目惊心,而她们在此种伦理环境下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各族公民信仰各有不同,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其他信仰均有其信徒,但伊斯兰教是宪法规定的马来西亚联邦宗教,地位与其他宗教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马来西亚宪法也承认宗教自由,但这种“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对于马来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从出生便已确立,马来西亚的所有马来人都是法定穆斯林;而一名马来西亚非马来族公民,如果其中一名家长改信伊斯兰教,则视其为“皈依者”,可以成为法律上的穆斯林。除联邦法律之外,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徒还受到伊斯兰教法管辖,教法规定所有的穆斯林禁止改教。依据各州法律,“叛教”(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的行为)重则可处以死刑,轻则可判处监禁、罚款或鞭刑(陈中和,2019,页 87)。因此,无论是本身信仰还是后来入教,仅有极少数穆斯林得以成功改教或脱教。2022 年马来西亚统计局报告指出,全国穆斯林人口占总人

口的 63.5%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2), 可见马来文化、伊斯兰文化在马来西亚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因此,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女性自然又陷入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特定伦理环境中。〈箱子〉里开杂货铺的华人老妇安雅发现店铺进贼, 警察只态度敷衍地来店门口转了转, “没有东西不见, 也没有人受伤, 我们还能做什么?” (贺淑芳, 2014, 页 69), 还反过来教育她 “没有严重的事也不一定要报警” (贺淑芳, 2014, 页 71)。〈湖面如镜〉中的大学女讲师因为教授 E.E.卡明斯 (Edward Estlin Cummings, 1894-1962) 的诗歌被学生投诉, 理由是认为她 “颂扬同性恋”, 而且还 “叫一个特定宗教的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正当她忐忑不安等待处置的期间, 另一位 “更加年轻也更多麻烦” 的女老师替她解除了危机: 对方的 “过错” 是在课堂上谈论宗教对女性身体的制约, 以及弯腰时身体越过了《古兰经》。〈Aminah〉和〈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两个短篇里, 出生在穆斯林家庭却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女孩洪美兰被父母强制送进康复中心, 那里的神职人员剥夺了她的姓名, 为她取名 Aminah (阿拉伯语意为 “忠心”)。在荒郊野岭, 在被铁丝网包围的营地里, 女孩最终陷入疯狂, 每晚裸身梦游。身处压抑的种族和宗教伦理环境中, 女性更轻易地成为了被迫害与压榨的对象。

作为女性一生主要的生存场域, 家庭和职场也给她们带来了潜在的伦理困境。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 (Chizuko Ueno, 1948-) 指出, 家庭这一私人领域, 是披着 “共同性” 外衣而实为压迫和统治的场所, 充斥着赤裸裸的暴力 (上野千鹤子, 2019, 页 49)。〈夏天的旋风〉这一短篇中, 苏琴是远嫁台湾的新娘, 而重组的家庭并不打算轻易接纳她。遵从母亲的教诲, 害怕独自老死的她不得不紧紧拥住丈夫和他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 竭力维持着外人看起来他们的确是一家人的假象。家庭这一看似 “爱之共同体” 的神圣领域, 却让她变成了异常疲惫、失去活力、僵硬得没有温度的人。〈墙〉中的安娣长期处在两堵墙的夹缝之间, 被压得喘不过气——一堵是屋后的隔音墙, 它挡住了阳光, 切断了后门的退路; 另一堵是无形之墙, 丈夫长期沉迷足球比赛, 对她漠不关心。在充斥着冷暴力的家庭伦理环境中, 安娣越来越瘦, 最终从狭窄的后巷里 “消失” 了。〈湖面如镜〉则以大学校园为例, 描写了女性在职场伦理环境中所遭遇的焦灼与困惑。无人关心女教师们到底教授什么, 但却严密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只要一句不够 “谨慎” 的话语, 或者一个未被察觉的 “敏感” 动作, 她们就必须承担被警告、被投诉、被解聘的后果。受困于异常严苛的职场环境, 她们整日战战兢兢、反省自己, “一天又过去了, 今天又说了什么? 是否不够小心, 是否说了什么使人误解, 是否这些话违背了真正的心意?” (贺淑芳, 2014, 页 90) 家庭与职场伦理环境在约束女性行为的同时, 还给她们一种无形的压迫与束缚, 使其深陷伦理漩涡难以脱身。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环境的产物。爱情、婚姻、宗教、种族、家庭、职场等多重不利的伦理环境压抑着这些女性角色的身心, 控制乃至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除此之外, 各自的伦理身份又进一步约束了她们的自由意志, 影响她们的伦理选择。

三、冲突与错位: 漂泊、边缘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 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与生俱来的, 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 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 2014, 页 263-264)。从某种程度上说, 人的伦理身份并不完全是由自己确立的, 伦理身份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得以体现, 且受到思想变化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曾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中说道, 女性一直无法以“我们”自称, 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 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一组织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 因为住房、家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附属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这种依附比起她们对其他女性的依附关系更为紧密。”(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 2002, 页 255)因此, 每当需要直面伦理问题时, 女性在伦理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心中充斥着极度的不安与无措。

《湖面如镜》中的女性角色都在极力从边缘地位与漂泊感中找寻身世与归宿, 反映出她们对于自身伦理身份的迷茫和困惑。《夏天的旋风》中, 丈夫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始终视苏琴为局外人, 独自老死的恐惧和焦躁日夜折磨着她, 可后妻与继母的身份将她挡在了欢乐伦常的幸福门外, 使她融入家庭的努力每每徒劳无功。《天空剧场》里剪头发的印尼女人原本是丈夫养的“小老婆”, 虽然因为丈夫意外死亡领到赔偿金, 买下房子开店实现了事业的成功, 但“见不得光”的伦理身份始终让她抬不起头, 她不愿也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来历, 只能数次在客人们“无心”的刺耳闲谈中躲出门去。《十月》中的菊子是 19 世纪末南来的日本女人, 家乡饥荒、瘟疫横行, 母亲把她卖给了陌生人。被一口窒闷木箱装着, 她被行船运到山打根成为妓女。边缘的伦理身份使她渴望抚平伤痛、得到救赎, 为了心爱的牧师, 她竟然用自己出卖身体、饱受耻辱与折磨所得的钱款捐资修建了一座教堂。而《Aminah》和《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的洪美兰是崩溃之后终日裸着身子梦游的女精神病患, “叛教者”的伦理身份为追求自由的美兰打上了“放荡不羁”、“思想偏激”、“迷途羔羊”等烙印, 和无数其他被关在“信仰之家”的女孩一样, 她们悄无声息地发疯了。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014，页 264）。《箱子》里的安雅是失去丈夫、远离儿女寡居的空巢老人，为了不给出嫁的女儿增添麻烦，她独自守着货物越堆越多的铺子，似乎想借此填满自己孤寂的生活。偶尔回家看望的孩子们与她没有共同话题，母女之间的对话更像是例行公事。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她感觉自己如此孤独，“我不要一个人，命再长也无甚乐趣”（贺淑芳，2014，页 68）。女儿将家中堆积的老物件看作是无用、占位、亟待处理的垃圾，而“散发着陈腐气味”、“又老又硬”、“沉重”等形容，是否不仅指涉这些旧货，也暗示了作者对“独居老妇”这一伦理身份状态的注解？同样孤独的还有《墙》中的安娣。故事一开始就交代了安娣膝下无子女，本应与她相依相伴的丈夫却对她视而不见——不回应她的谈话，不知道她养鱼、养猫，不关心她搬到厨房睡觉，更没察觉到她的异常瘦削，以致于安娣失踪数月后才意识到要寻找她。安娣在这段婚姻中仿佛是“隐形”的，不正常的夫妻伦理关系像猪笼草般吞噬了她，宣告了她“妻子”这个伦理身份的“死亡”。通过贺淑芳的叙述，安娣的伦理身份蜕变为丈夫生活中的“过客”，婚姻关系中的伦理冲突也由此消失。

而书里更多的女性角色一辈子留在了小镇上，过着日复一日、庸常卑琐的生活。《小镇三月》中，每个“没有未来”的女人都死气沉沉地住在这里：嗓音条件受限，不得不放弃当职业歌手的姑妈二十多年固守着一间小旅馆；杂货店里的老太“活像座钟”，整日摇着扇子坐在屋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右脚残疾、连洗个碗都不能的四姐“却好像浑不在意，连痛苦都从脑子里切割了”（贺淑芳，2014，页 217）。帮姑妈照看旅馆的翠伊仿佛也延续了这种生存模式，“小镇女孩”的身份把她禁锢在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子里，将少女的生命活力吸食殆尽。“她感到自己的右腿硬麻麻的，快变成木材了。也许我就要转化为木头人了也说不定”（贺淑芳，2014，页 216-217）。在小说中，这些女性角色很少有汹涌澎湃的情感表达，遭受的压迫也绝非惊心动魄，但一成不变的生活却如温火煮青蛙一样让她们身心疲惫，直至变为一个个木偶般的空心人。

伦理身份往往承载着相应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规范。伦理身份的转变就意味着人物的责任和义务也会随之转变，由此造成人物的伦理困境。陷入伦理困境中的人物有时会面临伦理恐惧，为了克服恐惧，走出困境，她们必须要做出伦理选择。受困于压抑且窒息的伦理环境，在漂泊又边缘的伦理身份裹挟下，《湖面如镜》中的女性角色们作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她们总在“出走”，又禁不住“回眸”，在凝视与被凝视间转换形貌，从挣扎中品尝活着的爱与苦。贺淑芳把所有伦理问题一一展开，让主人公自己找寻出路，做出决定，实现伦理价值。作家笔下的人物早已具备独立的思想，而她本人绝不会横加干涉，更不会刻意苛责或者褒扬。她尊重每个人物的伦理身份，正视每位女性角色的伦理选择，鼓励寻找多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并始终关注着女性在各种伦理困境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贺淑芳通过《湖面如镜》中的九个故事，描写出青年、中年和老年女性深陷伦理困境时的表

现——与男性相比她们是如此弱小, 自身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不得不在伦理混乱中苦苦挣扎。但她们都在不断地寻找出路, 努力从伦理困境中走出来, 鼓起勇气主动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

四、出走与回眸: 挣扎、纠结的伦理选择

从起源上说, 人的身份是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人如何进行自我选择的描写, 解决人的身份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 而且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 人物存在, 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 只要是选择, 必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只要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选择, 就会增加选择的复杂性和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就文学批评而言, 对伦理选择的分析过程, 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批评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中, 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聂珍钊, 2014, 页 267-268)。

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由来已久, 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在面对伦理困境时, 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纠结与疑虑, 常常被迫作出违背自身意愿的无奈选择。《天空剧场》中聚集在理发店的女性众生, 一边义正严词地声讨“第三者”, 一边为了自身利益死守名存实亡的婚姻。这类女性需要通过婚姻来确定自己的价值, 在她们的伦理认知中, 家庭是必须拼命守护的, 丈夫是她们唯一的依靠和精神支柱。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 这种认知体现了家庭主妇对丈夫强烈的依赖和惧怕心理, 此种生活态度也生动地反映了“传统定义中的女性气质给女性心理造成的影响”(黄芙蓉, 2013, 页 100)。她们告诫其他女性的话实际也是在催眠自己——“不要吵, 当着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那种事情不过是一时的迷恋而已, 不会贪恋太久。”“不要想不开。”“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说破, 他不说, 且装着不知道。”“要学习只眼开、只眼闭。”“这样他最后还会回来”(贺淑芳, 2014, 页 48)。女性在婚姻中更容易缺乏安全感与自信心, 没有经济来源, 依靠丈夫生存的家庭主妇们不敢独自面对莫测的未来, 不愿改变安稳的现状。她们害怕与丈夫的伦理关系从此恶化, 甚至婚姻破碎, 因此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放任丈夫的不忠。

不同于上述这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女性, 《湖面如镜》中更多的女性角色们或在有限的选择里不断“出走”, 打破现实伦理困境的桎梏; 或“回眸”反思自身过去及身边女性的遭际, 极力挣脱女性伦理身份带来的枷锁。《墙》中的安娣作为妻子, 在家庭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爱。然而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已使她渐渐习惯了丈夫的冷漠反应, 仿佛这在婚姻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事。直到有一天她养的爱猫不见了, 鱼缸也破了, 而端坐客厅的丈夫仍像个没事人似的,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态度终于让安娣愤怒, 乃至对丈夫彻底失望。伦理身份是评价道

德行为的前提，由于安娣思想的转变，丈夫现在的伦理身份在她心中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不再敞开的后院门也象征着安娣关闭的心门。孤独令她越来越瘦，直至能够穿过那窄窄的门缝。此后她像失去灵魂一样整日寻找着那只猫，最终“消失”在了后巷，彻底从婚姻和家庭中“出走”了。

“一个人体内如果流有穆斯林的血，到死也是穆斯林”（贺淑芳，2014，页120）。〈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申请退教的洪美兰被伊斯兰教法庭判处进入“信仰之家”学习，直到她自愿依从真主。刚来时女孩还会愤怒地回答别人的问题，或者哀求舍监让她离开。然而上诉被驳回，禁闭的期限一再延长，她开始反抗、诅咒、哭泣，之后蜷缩在床上沉默不语。无数个一百八十天过去，父母和异教的情人都不再来看她，美兰才意识到自己等不到自由了。最后，她终于“发了疯”，把长裙撕破，不带头巾，也不读《古兰经》，每晚脱光衣服在院子里游荡。被迫成为“阿米娜”的美兰只能选择躲入梦境，因为没有尽头的监禁已经看不到希望。故事最后，无数同洪美兰一样被指控举止浪荡、乖离教义、性别错乱或叛教的“阿米娜们”集体“中了邪”。为了躲避宗教与政府的压迫，女孩们不约而同地从荒诞的现实生活中“出走”了。她们想象着离开以后要去的地方，在梦中诉说很久以前就有的愿望——“不靠乌斯达兹，不靠舍监，不靠任何宣称对我有爱心的人，我要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像孩子那样重新出世。我要自己生下我自己”（贺淑芳，2014，页157）。

安娣的“消失”、阿米娜的“梦游”，超现实的叙述中呈现的是逃离孤独、渴望自由的现实意味。而〈夏天的旋风〉中，苏琴在过去的两年里急于证明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选择与丈夫冷战来表达不被接纳的不满。然而情况不仅没有因此好转，反而让她陷入了更尴尬的境地。在游乐场里，她本打算采取行动改变现在的关系，但一如既往的排斥让苏琴被失落和愤怒的情绪所包裹。游玩的最后，他们经过旋转咖啡杯，小孩失措地问她还要玩吗？丈夫也上前来阻止，表示大家都累了。但苏琴执意坐进咖啡杯里，并让孩子们快点进来——她变得不那么体贴和顺从了。随着杯子越转越快，大家的镇静和防备快速融化。每个人都大喊出声，不同口音的尖叫声共同萦绕在游乐场的上空。杯子停下来时，一切终于如同苏琴的想象：“他们四个人就像一般正常的家人那样，紧紧地粘在一起，像四块融化的方糖”（贺淑芳，2014，页35）。

小说集中最后一篇小说〈小镇三月〉里，翠伊最后终于决定逃离那种日复一日、麻木不仁的生活。她一遍又一遍地目睹那个每次都在同样的时间，入住同样的房间，重复相同外出路线的青年男子，对方却像失忆一样浑然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鬼魅的事情起初只是让翠伊感到困惑，最后已然变成一种启示：她不能再像自己接替的那两个马来妇女一样，二十多年如一日地打扫旅店，也不能活成杂货店里一成不变的老太婆，更不能像她残疾的四姐那样渐渐“硬化”。她意识到不该如此生活，不能光坐在这里等待，自己应该代替那个去而复返的青年男子

搭上火车。于是“她一头钻入这热炉般的巴士车站, 周围刹那暗了, 另一端依然曝亮, 光从铁花门泄出, 在地上折射如扇, 散开成无限多重的影子”(贺淑芳, 2014, 页 225)。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作者却已隐晦地给出了答案——翠伊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了伦理选择, 如扇般的光影象征着她打开了无限可能的未来。

残酷、沉重的叙述中, 贺淑芳仍然尊重笔下每个女性人物的伦理身份, 正视她们各自的伦理选择, 尝试寻找多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有时你以为是在结构中受害的人, 她却可能把自己看成具有选择权的人。正是这一点, 才能使一个人在最艰窘的环境中依然保有希望和自尊”(贺淑芳, 2014, 页 16)。尽管挣扎、纠结后的每一种伦理选择都不是完美的, 但《湖面如镜》中的女性角色仍不乏反叛、抗争、觉醒女性意识和自我救赎, 体现出贺淑芳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五、结语

贺淑芳通过《湖面如镜》中的九个故事, 以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女性为代表, 描写出她们深陷于压抑、窒息的伦理环境下, 基于各自漂泊又边缘的伦理身份, 在挣扎与纠结中做出的伦理选择。通过揭示女性的伦理身份、伦理挣扎与困境, 贺淑芳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 指明了女性不止生为女人, 也身为人; 在需尽的义务和责任下, 也有自由意志的追求; 反思了社会长久以来以高度的道德伦理来要求女性(女性也如此自我要求)的困境。对于当代女性如何打破如轮回一般的压迫, 重建被剥夺的话语权, 贺淑芳给出的回答是“回身拥抱自己, 自己创造自己,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母亲, 必须重新把自己生下来”(黄锦树, 2014, 页 228)。贺淑芳对女性议题的犀利思考与高度的自我指涉, 总能在世俗的庸常中, 一遍又一遍地逼视出她们的困境, 并透过文学面对、思考, 乃至解决这些困境, 表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她对女性议题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 陈中和(2019)。马来西亚穆斯林脱教的法律问题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 3, 85-100。
- 贺淑芳(2014)。《湖面如镜》。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黄芙蓉(2013)。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婚姻暴力与女性成长意识。《当代外国文学》, 4, 98-104。
- 黄锦树(2014)。在语言里重生。载于贺淑芳(主编), 《湖面如镜》(页 226-230)。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10月20日)。2020年世界妇女: 趋势和数据。United Nations。
www.un.org/zh/desa/women-report-2020
- 聂珍钊(2010)。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 1, 12-22。
-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上野千鹤子(2019)。《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0)。

- Lanser, S. S. (2002).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1992)。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2, February 14). *Launching of report on the key findings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2020*. DOSM.
www.dosm.gov.my/portal-main/release-content/launching-of-report-on-the-key-findings-population-and-housing-census-of-malaysia-2020-
- Subramaniam, T. (2023, March 7). Gender equality will take 300 years to achieve, UN chief warns.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3/03/07/world/un-gender-equality-300-years-intl-hnk/index.html>